

范磊：“小邦大治”，（中）

新加坡的多元族群治理有何启示？

策。

平等多元的族群政策积极引领和推动了新加坡族群共存共融局面的形成，但不同族群间的发展不平衡依然存在，跨族群互动也曾不理想，国家共同体的认同基础甚至有些脆弱。为此，政府通过硬性的制度保障来强化更为稳固的治理模式，包括为确保新加坡少数族群政治参与比例的集选区制度、总统保留选举制度、促进跨族群交往交流交融的政府组屋按族群比例混居制度等。通过一系列精准的制度设计，保障少数族群在国家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维系和推动不同族群之间的利益均衡、规范协同和认同共融。

中新社记者：儒

学在新加坡族群治理中发挥了何种作用？

范磊：儒学对新加坡而言，是一个纠结的存在。作为源自特定族群历史文化的传统伦理，儒学带有清晰的华人烙印，其在新加坡族群治理中所发挥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需要辩证来看。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人民行动党政府对建国以后的文化政策和国家价值体系缺失的反思，新一轮的儒学复兴运动得以在亚洲价值观的架构下赢得发展机遇，并逐渐融合为国家价值体系的一部分。

但人民行动党政府也意识到如从官方角度来倡导某一族群的文化和价值规范必然会出现族群同化和泛化的隐忧，引起其

他族群不满和反对。所以，政府一方面通过影响舆论来引导社会大讨论，强调儒学并非具有国别和族群标签的狭隘价值观，而是与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教义一样都是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则邀请了余英时、杜维明、熊玠等八位知名新儒学代表人物访问新加坡，基于全面调研来制定合理的儒学复兴计划，从而推动新加坡“成为一粒洒向这个多元世界的全球性文明的种子”。

政府还将儒家伦理课程作为选修课引入学校教育，避免因在全社会大幅推广而造成其他族群恐慌与不满。同时，强调儒家思想只是一种伦理体系和生活规

范，与其他宗教教义不对立，更不会构成威胁。政府也希望借推动儒家伦理课程，将儒家文化中的精华纳入国家价值体系，使其能够跨越族群边界，成为各族群都能接受的共同价值的一部分。

但儒家伦理终究还是无法完全“溶入”所有族群新加坡人的价值基因，政府只好尝试在国家层面以更为中性和全面的价值规范来取代它。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政府深入挖掘各族群的文化、宗教以及历史传统和规范的共同属性，建构出影响深远的“亚洲价值观”，并最终在吴作栋政府的推动下于1991年出台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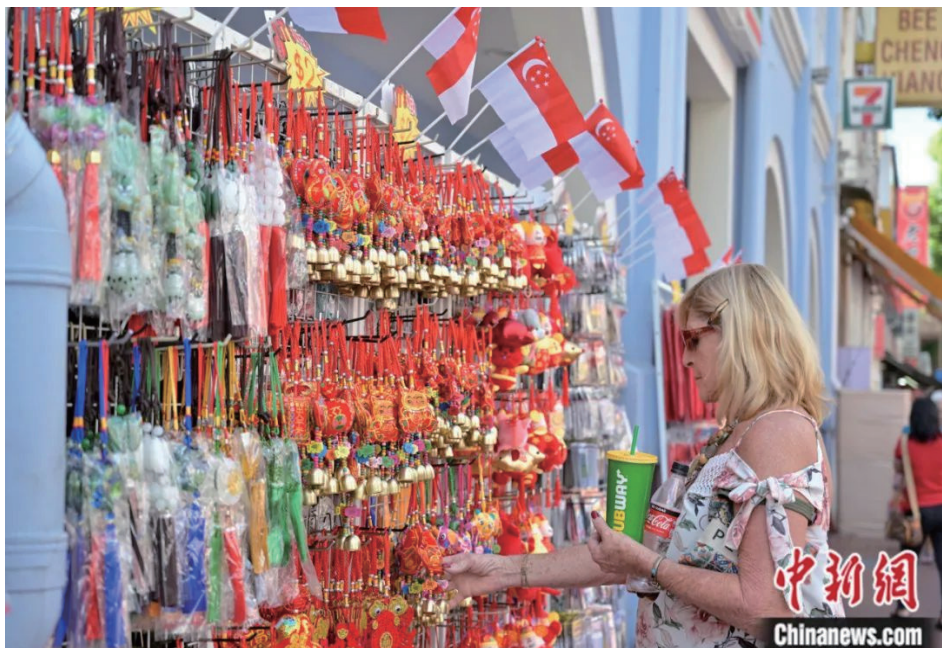
总之，儒学这一

价值体系在新加坡族群治理中只是特定时期以李光耀为代表的人民行动党政府选定的塑造和建构“共同价值观”体系的一块敲门砖，并在完成其历史使命之后化身为该体系的奠基石之一。

中新社记者：新加坡的族群治理模式对其他多族群国家有何启示？

范磊：新加坡族群治理的成功引发了外界对其治理模式的关注和思考。对其他同类型国家而言，这一模式的参照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府主导的国家中心色彩。国家在新加坡族群治理中扮演主导性角色，以政府为代表的官方治理体系在该公共进



新加坡街头售卖的工艺品。
中新社记者 俞靖 摄



新加坡中小学生在着汉服祭拜孔子。
中新社记者 邱勇 摄